

六朝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肖泽民

南京出版社



六朝经济

陈明光 邱 敏 著

六朝经济

◎ 六朝文化丛书

◎ 丛书主编 肖泽民

◎ 陈明光 邱敏 著

◎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经济 / 陈明光, 邱敏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0. 5

(六朝文化丛书. 第2辑/肖泽民主编)

ISBN 978-7-80718-604-5

I. ①六… II. ①陈… ②邱…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IV. ①F129.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5393 号

六朝文化丛书

六朝经济

陈明光 邱敏 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60 千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

ISBN 978-7-80718-604-5

定价: 42.00 元

《六朝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 凭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平 卢海鸣 牟发松 李 凭

肖泽民 何德章 沈先金 陈长琦

陈明光 张学锋 赵国华 胡阿祥

钱国旗 程章灿

主 编 肖泽民

丛 书 总 序

李 凭

狭义的六朝概念，特指定都于建业（建康）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政权。广义的六朝概念，也用以泛指三国两晋南北朝，即包含秦汉与隋唐两大统一时期之间的动荡分裂时期。两者相比，狭义的六朝概念既准确又具体，因此较为流行。不过，在东吴和东晋之间，存在着西晋统治长江以南的 37 年，因此狭义的六朝概念在时间上并不是连贯的。但是，东吴与东晋南朝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晋在时空上的横亘，而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考察，在研究上是欠科学的，在表述上也欠完整。所以，广义的六朝概念也一直具有存在的理由。

要将六朝作全面深入的论述，就必须对相关社会状况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是连绵不断的。因此，狭义的六朝概念和广义的六朝概念，都不可轻易地摈弃。然而，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又不能随心所欲，忽而运用狭义的概念，忽而运用广义的概念。我以为，若将上述两种概念折衷起来去理解六朝，可能会方便于我们的考察。那就是，在空间上，将以建业（建康）为中心的江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则并不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将东吴与东晋之间的 37 年分割出来，而应毫不间断地将

东吴政权建立的 229 年至陈灭于隋的 589 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作整体性的描述。简而言之,就是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 229 年至 589 年的历史过程定义为六朝。当然,这样折衷而成的概念是否妥当,还有待于验证。

六朝均偏踞江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三百余年中经历了六个朝代的更迭,但是除东晋末年的五斗米道起事和梁朝末年的侯景之难这两次席卷江南主要地区的动乱之外,总体上看江南社会还是安定的时间多于动荡的时间。江南诸朝廷的国运均甚短促,在王朝交替之时,不乏大小规模的战争,但大多是局部的;在政权嬗让之间,不乏大小规模的政变,但大多发生于上层。这些战争与政变未能从根本上阻挡住六朝社会的总体发展。当黄河流域长期动荡不安之际,六朝的社会却每隔三五十年便会间断性地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其间战乱暂时平息,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因此成为中原士族与广大民众投奔与向往的境地。

六朝虽不足四百年,却能够在七千余年的江南地方文明史上凸显出来,那是因为,在此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实力长足增长,竟然跃进至全国最领先的地位。六朝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心位于中原,江南的地方经济是相对落后的。六朝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六朝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江南的地方经济继续领先发展,并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

上述江南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个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也就是说,从何时起中国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南移到江南,对此学术界历来的看法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江南何时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发生于汉唐之间的

一场社会经济的巨大质变的精确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统计数字充足的现代经济学中,应该能做得相当准确。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由于记载的模糊性和数据的粗略性,其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各家的看法也就差别很大了。

一般认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但是,近年蒋福亚教授通过对《南齐书》、《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所载史料的比勘,获得了崭新的见解,将江南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的时间界定于六朝。他确切地指出:“三吴在宋齐之交就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第一章第五节之二《新经济重心形成时间蠡测》,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出版)蒋福亚教授的研究结果十分重要,其意义在于,将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发生的时间较一般的认识提前大约三百年。这样崭新的认识,不仅使得学术界在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上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而且,对于六朝社会经济的认识也随之改观,令我们不得不从新的高度去评价六朝。

不过,在六朝之前,江南却长期被误认为是未开化之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由于这番话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笔,而“丈夫早夭”等词句又十分形象生动,所以很有感染力,但是它给早期江南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司马迁的这段话语之下,裴骃《集解》就曾引应劭之语注释道:“堇,少也。更,偿也。言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在裴骃、应劭看来,豫章与长沙虽然出产黄金等贵重矿物,但是产量极少,因此产出不能抵偿投入。所以,后世的人们读到此处,便会误以为早期的江南均系贫瘠之地。

其实,上引“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等语中的“江南”,系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汉代属于南楚的一部分。因为,就在此语之前,

司马迁写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针对这段话，后来的学者有过争辩。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但是，张守节《正义》却否定裴骃与徐广的看法，他指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按照张守节的说法，《货殖列传》中的“江南”，乃是“豫章、长沙”二郡的定语，意思为大江以南。但是，在行文中，由于“江南”被夹在“九江”和“豫章”中间，遂被裴骃与徐广曲解成为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并列的郡。为了证明其说，裴骃与徐广又有所谓“江南者，丹阳也”之论。然而，丹阳不在南楚，明是东楚之地，裴、徐之说不能自圆，张守节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不过，裴、徐之说影响较大，一直贻误至今。甚至连中华书局的《史记》标点本也附和其说，而在《货殖列传》中，将“九江”与“江南”之间，“江南”与“豫章”之间，均标点成为顿号，从而误导读者将此“江南”理解成为郡级行政地区，而非“豫章、长沙”的定语。拙见以为，这一错误应该纠正过来。将现行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相应句子中的“九江”之下的顿号改成逗号，“江南”之下的顿号去除，可能才合乎司马迁的本意。

大江以南的豫章、长沙二郡，在司马迁的笔下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不过，这样的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上个世纪 70 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东郊五里牌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上个世纪 90 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五一广场的走马楼吴简被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文物和内涵丰富的简册出土问世，实在令人惊讶不已，从而改变了过去以为古代长沙附近十分落后的陈旧观念。

更何况，豫章、长沙二郡并不能代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当

人们注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语时，却忽略了司马迁在同一卷中对于豫章、长沙二郡的东邻长江下游地区的赞美之词。《货殖列传》中记载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对于这段记载，张守节《正义》注释道：“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司马迁所谓的东楚，其南部近半之地位于长江下游以南；其中所说的“吴”，正是上引蒋福亚文中的“三吴”之一。与上述位于长江中游以南的南楚之地的物产、风俗不同，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在当时就相当富庶。可见，司马迁并未将早期的江南全部视为贫瘠的地区。

不过，后世关于江南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一般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其地相当于司马迁所谓的东楚的南部加南楚的东部，包括如今的上海市，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由于长江在九江至建业（建康）一段呈西南往东北流向，因此在六朝之际狭义的江南又被称为江东。

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但由于河流湖泊纵横，被分割成为若干文明区域。这些文明区域中，最发达的就是上述狭义的江南，也即江东。江东早期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在如今的苏南、皖南、赣东、浙北，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遗址的特点是，分布密集，遗物丰富，它们说明早在十几万以前江东就已经是古人类的生存之地了。

降至新石器时代,江东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更是举世闻名。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广泛,其中多处发现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并出土了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稻谷和动物骨骼。经过分析,表明七千年以前的江东就已经有了耜耕农业和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这在国内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水平中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良渚文化的主要遗址距今约五千年,更是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实现犁耕稻作,手工业表现出专业化的倾向;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黑陶、玉器和纺轮上,刻画着象形的符号或画面;而良渚文化遗址中明显的贵族大墓和平民小墓的分野,则表明当时社会的分化和等级的出现。如果说距今五千年是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类从野蛮往文明过渡的界限,那么良渚文化正是这条界限上的东方明珠。不仅如此,良渚文化对其他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近在江西、湖北,远达陕西、广东,都有良渚文化类型的器物出土,这令人不得不赞叹良渚文化扩散范围之广泛。良渚文化之所以能向邻近的地区渗透,是因为它的发展程度高于周围的地区,能够成为周围地区学习的对象;良渚文化之所以会向更远的地区扩散,是因为它具有独具特色的魅力,能够引起更远地区的向往。良渚文化的渗透与扩散应该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而当它与其他文化接触、混合、交流、融汇时,就出现了升华,形成具有新兴特色的文化。大约距今四千年左右,良渚文化似乎消失了。其实,更加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消融了,在不断地向外拓展与渗透的过程中,消融在其他新兴的文化之中了。例如,作为良渚文化主要内涵的玉器的形制,就在中原的商周文化中存有或隐或现的影子。

要之,江东的先民早就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与中原一样,江东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说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

的,那么江东的先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元。而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诸如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龙山文化等,陆续地融汇其中,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从黄河中游发育起来的华夏文化,吸收上述种种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形态。

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最初源于上古时代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众多部落,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置于关中,使华夏文明的影响显著扩大,从而奠定中华文明西胜过东、北强于南的局面。东汉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接近乃至超过长安,于是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覆盖区。相对而言,华夏文明覆盖区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代表当时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而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周边地区,包括江东在内,则均被视为偏远地区。

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发生一系列大的战乱,中小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势如汹涌的波涛,摧决了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刷洗了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都被夷为废墟,汉族王朝的版图被林立的少数民族邦国瓜分。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幸存的士族与民众纷纷流徙偏远地区。而在这些徙民之中,以逃亡江东者居多。随着大批士族与民众的南下,包括秦汉魏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华夏文明也被带到江东。在此基础上,东吴、东晋和宋、齐、梁等政权相继建立起来。不过,由于这些政权的主导来自北方,遂使上述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看法更加强化,进而形成长江以南的开化主要得力于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观念。其实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当中原华夏文明盛行的时候,周边的地方特色文化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曾经跃跃欲试,与中原诸侯抗衡,正是江东先民创造的文化基业仍然具有强劲势头的例证。东汉、西晋的中央集权统治崩溃以后,吸纳中原土族与民众最多的地区是江东。这说明江东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优越于其他地区,否则就不会成为中原徙民的首选目的地。只是因为长期偏离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心地区,所以在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江东处于相对冷落的地步。然而,当北方大批的土族与民众南下江东,并且带来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之时,一度沉寂的江东地方文化因受到强烈的对比与冲击而被激活了。

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上,中原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促使江东的社会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序》所记载的,“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六朝中期江东出现了和谐富裕的局面。与此相应,江东在文化、教育与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从而构筑成六朝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江东众多的文明成果与来自北方的传统华夏文明相融,进而升华成为新的地方文明,我们不妨称之为六朝文明。六朝文明源于江东,其中心则在六朝都城建业(建康)。随着文明的渗透与扩散,交流与融汇,六朝文明覆盖的地域便日益伸展,影响遍及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即广义的江南地区。

应该提到的是,在六朝后期,兴起于珠江三角洲的陈朝的建立,密切了岭南与江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曾为六朝文明注入新鲜的营养。

以南地区文化的总体发展,特别是历史悠久的江东地方文化的突出发展;六朝文明形成的外因,则主要是来自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影响。谈到影响,其实也是相互的,当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积储于长江以南的物资财富与精神文化成果就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北方传统的华夏文明,进而推动整个中华文明的升华。那末,六朝文明的成果究竟有哪些呢?形成六朝文明的内因包括哪些内容呢?在六朝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吸取了哪些外来的因素呢?这些都是值得全面深入地了解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它们并非历史的陈迹,而是浸润现实的甘露;它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瑰宝,而且是构成现实文化的精华。六朝文明虽成既往,却在深远地影响现实。

六朝文明的深远影响,为六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争得了光辉夺目的地位。如今恰逢中华民族现代社会的盛世,六朝故地又在迎接新一轮灿烂的前景。江南的先民,曾经自强不息,将江南开拓成为人杰地灵的宝地。现代的江南人民,更加坚韧不拔,他们发扬积极进取的精神,誓将富饶的江南建设成为锦绣的世界。他们不仅为六朝丰富的文物感到骄傲,而且更渴望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从六朝文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将之输入江南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所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经过江南地方文化和中原华夏文明交融结合而成的六朝文明的丰富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为此,坐落于六朝古都的南京出版社,牢牢地抓住历史契机,努力寻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事业完美结合的环节,适时地推出规模恢宏的《六朝文化丛书》,这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举动。这套丛书旨在全方位地介绍六朝文明的成就,系统地描绘六朝文明的来龙去脉,深入地探讨造就六朝文明的内因与外因,从而准确地总结六朝的历史经验。了解既往的文明,目的在于推动现实的

发展。《六朝文化丛书》必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新时代江南文化事业的繁荣服务,为江南社会的富强作出贡献。

自本世纪之初发轫,该丛书出版了第一批十本专著,它们是《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学》、《六朝艺术》、《六朝史学》、《六朝宗教》、《六朝经学与玄学》、《六朝科技》、《六朝民俗》、《六朝文物》和《六朝都城》。参加丛书编写工作的作者,都是学识渊博的专家,特别是张耀华主任和陈安吉主编,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第一批专著均为精湛之作,颇具社会影响。不过,六朝文明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只有持续地推出更多的专著,才能不断地满足越来越高涨的文化事业的需要。

2007年冬,正当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之际,南京出版社肖泽民副社长和卢海鸣主任专程到会,约我共事,组织第二批的十本专著。我自觉能力有限,颇感难以担此重任。然而,南京出版社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弘扬家乡的文化事业也是我江东子弟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只得勉为其难了。幸好有十位名家学者欣然支持,允诺承担各部专著的撰写任务,令我不胜感激;而且,肖泽民先生亲任主编,更使我喜出望外。我希望,第二套《六朝文化丛书》像第一套《六朝文化丛书》那样,获得学术界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8年元旦于华南雨静苑

(作者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六朝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前 言

本书所写六朝经济,是区域的和国别的断代经济史。如所周知,“六朝”通常是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国都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前后更代的地区性政权。在时间上,如果从公元 195 年孙策渡江开创吴国业基算起,到公元 589 年隋军渡江灭陈为止,历时近 4 个世纪(其中自 280~316 年的 37 年由西晋统一中国)。在空间上,六朝的疆域范围有所变化。孙吴疆土东抵东海,南及南海兼有交趾,北自江北与曹魏分界,西沿三峡及今湖南、贵州、云南、广西交界与蜀汉为邻;以今地论,包括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市的全部,湖北、安徽、江苏、广西、贵州等省区的一部及越南的中北部、四川的一隅。东晋较稳定的疆域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及南海兼有交趾。南朝疆域变化较大,今人有“伸于宋,屈于齐,赢于梁,缩于陈”之说。不过六朝疆域的变化多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到今广东、广西的疆域是基本稳定的。^① 换言之,六朝的疆域主体是中国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尤其以长江中下游以南为稳定的国土。这就使“六朝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对象,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故可称为“区

^① 参见胡阿祥:《六朝政区》,南京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90~392 页。

域的和国别的断代经济史”。

概言之,“六朝经济”主要论述的应是发生在六朝时期长江以南地区人类的经济活动。对此我国学术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

六朝经济是以秦汉以来江南经济发展为起点的。黄今言先生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从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林、牧、渔业的多种经营;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的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等方面所作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六朝南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

关于六朝经济史的学术积累,最为丰富的是专题论文。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分别论述六朝某一政权或以“六朝”、“南朝”为时限的经济史专题论文纷呈。唐长孺先生 1955 年以来结集出版的三部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山居存稿》(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其中的相关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学术繁荣和现实关怀,学者对六朝经济的专题探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并陆续汇集出版,如周一良先生著《魏晋南北朝札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中国唐史学会等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朱绍侯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高敏先生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郑欣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朱大渭先生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 1998 年版)、郑学檬先生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新版)、黎虎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熊德基先生《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 2000 年版)、蒋福亚先生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

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等,使今人查找和参考更为方便。至于散见于学术刊物的有关六朝经济的单篇论文则不胜枚举。

就论著的主题与体例而言,以“魏晋南北朝”为名的断代史著,如王仲荦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韩国磐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等,对于六朝经济内容都有专章或专题论述。何德章先生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则是首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专著,其中有关六朝经济史的篇幅不小。

专门以“六朝”之某一时段如孙吴、东晋、南朝,或者以“六朝”为题的经济史著迄今尚不多见。陈啸江先生著《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1936 年版)虽然以“三国”为名,其实是以“三国时期”为论述对象的,该书掇拾资料分农业、工业、人口、一般流通、财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消费风气等专题作了简略论述,但在各个专题中都没有分魏、蜀、吴作国别的论述。对六朝经济这一“区域的和国别的断代经济史”体例有开创奠基之功的,则是韩国磐先生著《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①。该书从等级编制、田制和农业、户口和赋役、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经济等方面,首次以“南朝”为断代论述了中国南方经济的主要方面及基本情况。余鹏飞先生著《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则在专题之下分国别论述,其中对吴国的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交通和都市都专门立目加以论述。这无疑使吴国的经济面貌清晰了起来。其后,第一次以“六朝”为断代的经济史专著是许辉、蒋福亚二先生主编的《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该书分导论、经济区的开发、大土地所有

^① 后收入韩国磐著《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